

景观社会中的囚徒 ——解析《风采》版陆老事件

作者 / 梁美珊 Jan 23, 2009 05:39:21 pm

【特约评论 / 梁美珊】为何是封面头条？为何是“独家报道”？为何作大幅度报道？陆庭谕性骚扰事件在今年1月21日已不再是“新”闻，那么试想想，是什么因素让《风采》的这一系列报道再一次让读者觉得有“看头”？



是图像。试想想，《风采》及《中国报》的“陆老又亲女记者”报道中，除了图像以外，还剩下什么？如果没有那些触动人心的新闻图片的话，可能就没有了封面、没有了独家报道，也不可能有大幅度的报道。当然，如果《风采》的女记者没有坐在陆老的“最”旁边，也很难有那些图像。

图像是关键。在这个资讯爆发的时代，亦真亦假的现象太多了，让人很难分别是虚是实，很多时候都需要有图为证，才相信事情是真的。《风采》杂志总编辑林惠霞接受《独立新闻在线》访问时，宣称是为了“有疑心读者投书”，才决定派记者彻查此事的真实性。如果没有“一图胜千言”的话，相信《风采》也很难向该读者交待。

图像是采访的最终目的。在《受害人心声》短文中，有一段写着“离开现场没多久，陆老又来电了。主要是因为他担心照片曝光，希望我们小心处理。‘你知道，我现在是处于敏感时期，万一真的照片曝光，我就麻烦了。’”倘若《风采》确实有表明是去采访，为何在“受访者”表达不愿意照片曝光后，还一意孤行刊登那些图像？

为何《中国报》也刊登？按媒体作业规范常理而言，媒体应经受访者同意方刊登其样貌，更何况这是一些不是人人都愿意公开的煽情相片。倘若未经受访者同意就刊登，那可是新闻侵权。如果事件如陆庭谕的长子陆华宗所指控，《风采》杂志的记者由始至终隐瞒其记者身份和采访动机，以达采访目的，则新闻伦理与专业尊严恐怕坦然无存了。

“眼见”不一定“为真”

图像不代表真实。图像只是事件的“再现”，而且我们看到图像很多时候都经过编辑，不能全然反映原来的事件，但偏偏有人想用15秒影像“证明”事件没有发生，另一些人则要用好几张图像“证明”事件存在。



在法国哲学家德波（Guy Debord）宣判一个充斥着图像的“景象社会”（The Society of Spectacle）的到来之际，很多人都选择相信“有图为证”，因此符号往往胜过实物，表象往往胜过现实。从《风采》及《中国报》的报道可以看出，文字内容的贫乏（lack），图像却驾驭着整篇报道，因为形象可以表达出语言无法表达的事物，而且更具煽动性。

在这些报道中，我们都涉入了“观看”这件事，但“眼见”（seeing）不一定“为真”（believing），更多是一种“诠释”（interpreting）。媒体刊登的图像不像快照

(snapshot) 那么简单，毕竟新闻图像往往是一种制作，而制作流程包括：（一）决定什么是新闻焦点；（二）选择报道的材料、角度及立场。这种人为建构的真实，往往影响我们对真实世界的认知。

为何非得刊登那些照片？媒体是为公众的知情权 (the right to know) 服务？读者有权“看”这些煽情的图像吗？读者有权通过这些图像了解所谓的“真相”吗？很多时候媒体都会假公众利益 (public interest) 之名合理化所作所为，《风采》及《中国报》不理睬陆庭谕的担心，一意孤行刊登煽情的图像，恐怕正是由于认定如此可以提供读者想看见的事物。

读者想看就会想买，想买就会刺激发行量，发行量高就会吸引广告商的青睐。《中国报》很显著的一句置入性广告：“详细报道请见最新一期《风采》”，可见他们非常努力地争取发行量。

新闻是一种商品，很多时候媒体为了刺激发行量而偏离伦理与专业的判断基准，为了确保有利可图而产制大量肤浅、低俗的新闻满足读者的娱乐消费。在商业化的媒体当中，为了制造景观与娱乐，媒体的重要版位刊登的往往不是关切民生的课题，而是重复渲染内容贫瘠的新闻炒作。然而，读者真的喜欢“看”吗？还是媒体一厢情愿的认定这些内容可以吸引读者的景观 (spectacles)。这就要问1月21日的《中国报》及最新一期《风采》销售量，或者那些认为陆老的煽情图像很吸引眼球的人了。



记者的热诚会不会过剩了？


如何得到媒体想要的图像？一般情况下，记者很少有机会目击新闻事件的发生，所以新闻消息来源与媒体的重叠性不高。消息来源与媒体的重叠性可分为显性与隐性，显性重叠是媒体直接策划和发起的事件，隐性重叠则是媒体没有致使事件的发生，却在事件演变中做了人为的设计和导演。媒体有意识地介入事件的发生与演变，乃违背新闻专业伦理的行为，因为读者想知道的是事实，而不是媒体“制造”的事件。

美国史学家布尔斯廷 (D. Boorstin) 就指出，我们接触的新闻越来越多是“假事件” (pseudo-events)，其特征有：（一）事件的发生不是自发性的，而是有计划的；（二）事件的趣味性受关注；（三）事件的发展非常戏剧化等。“假事件”之所以会流行，是由于人们欲想得到事实的全部，而且越多越好，甚至比现实还要多。在《风采》报道的陆老事件中，男记者没有适时阻止，甚至还能拍下连环图，女记者为了任务（收集有新闻价值的材料）而忍辱负重。据《风采》编辑部对事件的回应，四位社会新鲜人投身新闻工作是秉持着探真相、讲真话的热诚。但是，这四位社会新鲜人的热诚会不会过剩了？



水门事件后，《华盛顿邮报》发行人葛兰姆（Katherine Graham）提出警告，新闻人员不能自视为游侠、骑士，以捍卫公共福祉为己任：整个新闻界被某些人抹上了英雄色彩，这不是新闻界原本该扮演的角色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，这角色也很危险，反映的是其他社会机制未能善尽其责。

无论是《风采》的四位媒体新鲜人为了完成揭发“真相”的任务而“牺牲”，还是《中国报》在1月22日以《陆老，我们会帮你》作为头条新闻，看似要帮助陆庭谕，其所作所为实际上已超越了媒体的社会职能。大量的报道、空乏的内容，煽情的渲染被骚扰的情景，用重复又重复的问题访问不同对象，张贴大幅网络文章充斥版面，目的是为了一个可以被消费的景观（spectacles），而媒体、受害者及读者，都不知不觉地成了景观社会的囚徒。

 梁美珊是英国考文垂大学（Conventry University）视觉文化硕士，现任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讲师。
